



## 重庆钓鱼城遗址：

# 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军事智慧



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半岛，是宋元战争时期川渝战区最重要的军事山城。经过20余年的持续考古发掘与研究，学界对钓鱼城遗址逐渐建立起一套以考古、文献和地理互证为基础的空间格局演变认知体系，系统展现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钓鱼城遗址大规模发掘始于2004年，迄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在15处遗址点展开工作，包括古地道、皇宫、武道衙门、护国寺、南一字城、始关门、九口锅、大天池、土地岩、加担土等，总发掘面积近4万平方米，基本廓清了遗址的平面布局及格局演变。宋、清遗迹差异可辨、分期明确。尤其是南宋1240年、1243年、1254年、1263年四个重要修筑阶段，均可通过夯土色差和包石形制进行区分。

2024年度发掘区域名为“加担土”，按考古学惯例称为“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发掘区”。本次发掘以钓鱼城遗址的青华门为核心，试图用有限的发掘面积揭示出大遗址空间布局的关键构成要素，考古发现城门单体建筑基址、御河沟两岸的大规模夯筑高台，以及最终围合形成的人工峡谷地貌。青华门向内收缩至沟谷中部，形成内外双瓮城结构。由此可见，钓鱼城核心的筑城理念是营造巨大高差，使守方居高临下，从而形成极具优势的攻防态势。这一理念不仅展现出宋军的高超战略与战术设计，也为川渝宋元山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13世纪，南宋为应对蒙古势力的扩张，将国土划分为川陕、京湖、江淮三大战区。其中，川陕战区大致涵盖今重庆全域、四川大部及周边五省部分地区，学界称为“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通过考古与文献对比，确认该地区至少曾建有117座军事城寨，其中宋方104座、蒙元13座。

青华门位于遗址东北部，是钓鱼城的关键门户。城防设计者巧妙利用小山丘之间的沟壑，修筑三处大型高台，通过清除浮土、换填土石进行夯筑。初期用细黏土加少量小砂岩块夯实，重庆大学岩土实验室检测其强度最高达10兆帕，远超一般黏土夯筑的1兆帕极限，接近常规水泥。这一“夯土基”由几厘米到10余厘米的夯层组成，厚度2米至3米。其上为以重数十斤的异形石块为主的夯层。细泥与石块夯层，层层叠加，总体厚度最厚处可达10米。城门外的两处高台与城墙配合形成“U

型”外瓮城，城门内三座高台围合成内瓮城，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而“瓮”的空间仅1000平方米左右，其形制突破了既往对瓮城结构的认知。传统瓮城的城墙宽度多在10米以内，此处却用宽达数十米的高台围合成大台小瓮的超常规形制，极有利于阻击方对进攻方的歼灭。

考古揭示，城门外道路至少有三期演变：木栈道-石梯道-小石径，均须爬坡穿越城门外临近右边高台下方的城墙区域，有效拉长敌军进攻路径及被弹面。此次发现的两座南宋城门，分别属第二组（1243年）和第三组（1254年）遗迹。第二组城门偏左，较宽大，进城后在基岩上开凿5米多宽的石梯道，梯步高20厘米左右，宽约80至100厘米。进门后拐向左边的城墙，梯道穿行在城墙与山崖之间，形成一个宽5米、长80多米的内瓮城。第三组城门右移更靠右边的高台，变窄，在保持梯道瓮城的同时，又利用城门正前方采石形成了一个近1000平方米的大坑，增加了新的瓮城。两个城门推测其结构均为排叉柱式，体现出典型的南宋山城防御风格。高台上的哨台、城门配套设施等，也展现了南宋在山地城防技术上的全面创新。

钓鱼城的高台设计，不仅强化了钓鱼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出南宋在山地防御体系上的智慧。它不仅依赖地形优势，还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

青华门的重要性，还体现出南宋与蒙元双方攻防智慧交锋的焦点。从蒙军的角度来看，进攻青华门具备三大优势：地势突出、便于围攻；缓坡通道、便于推进；位于钓鱼城的必经前哨。而对宋军来说，是防御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是对其营城智慧与战术安排的双重考验。而城门后靠，内外双瓮城设计、内部双瓮城结构，正是南宋军队克服地势劣势进行有效布防，有效应对敌军攻城创新举措。

总之，钓鱼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揭示了南宋时期卓越的山地城防体系，也显示了川渝地区先民独特的营城智慧。特别是青华门的高台设计，在战略防御、材料工艺和战术运用等方面，均体现了极高水平，是中华军事文化的宝贵遗产。此外，钓鱼城遗址同时较好地保存了宋元双方的军事、政治、文化及宗教遗产，比如护国寺、忠义祠、九口锅、王坚记功德碑等遗存，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关键节点的重要例证。袁东山 据《学习时报》

## 林徽因与小说

林徽因是20世纪初期著名的才女，许多人都喜欢她写的诗，因此，人们常常把林徽因和诗联系在一起，其实，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她和小说也有着不解之缘……

1936年，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一书，20人应约推选作品，除林徽因之外，茅盾、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都是文坛名家。林徽因推选了张天翼、萧乾、罗淑3个人的小说，颇具眼力。尤其是罗淑，因为林徽因的推选，从当时的无名作者中脱颖而出，林徽因可谓慧眼识英雄。林徽因推选的罗淑的《生人妻》这篇小说，后来成了传世之作。由此可以看出，林徽因有着很高的小说鉴赏水平。

1936年正值《大公报》创刊10周年，萧乾要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小说选集，当时，萧乾觉得最合适的编选人是林徽因，于是，萧乾就把编选这本小说集的工作交给了林徽因。林徽因不负萧乾所望，很快编出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一书，入选小说30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说，题目是《小还的悲哀》，当时这篇小说的作者署名是“叔文”。无论名家或非名家，这本小说选集所选的作品都堪称是上乘之作，包括张兆和的那篇小说，绝非因私人感情而滥竽充数。林徽因还为这本小说选集写了两三千字的《题记》，阐述了她对小说的精辟见解。林徽因编选的这本小说选集在当时很受读者欢迎，当年8月份初版，10月份再版。50多年后，上海书店又影印出版。

对于当时的小说作家，林徽因非常赏识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因便看出他以后在小说创作上必会有不俗的成就。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小说作品，准备赠给另一位诗人，林徽因见到后，很想得到沈从文的这本小说作品，沈从文就在这本小说集的扉页写道：“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然后，把这本小说集送给了林徽因。

北平解放，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了赵树理的小说。当时，林徽因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中的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及健康清新的生活风貌，使林徽因十分赞赏，她还从赵树理的小说中看出了沈从文的影响。

林徽因在诗歌创作伊始，就开始了小说创作。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是1931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窘》，写的是一个中年教授与一个同事的女儿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这是林徽因尝试写小说的开始，说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可是，她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绘，足以显示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才华。1934年，林徽因发表了《九十九度中》这篇小说，以内容鲜明、技巧娴熟名噪当时的文坛。对于林徽因的这篇小说，评论家李健吾著文赞叹道：“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利落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我所要问的是，她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确实，林徽因的这篇小说把酷暑的北京街头形形色色披露细腻地描绘了出来，处处透露匠心，这是林徽因对小说的意识流创作手法非常成功的探索。

林徽因的小说多数是体现京派风格的作品，如《钟绿》《吉公》《文珍》《绣绣》这些系列小说，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大题目，叫作《模影零篇》。《模影零篇》系列小说用回叙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文字淡淡的，却耐人咀嚼，读来感觉素雅、淡远、隽永。

林徽因对自己写的小说是充满自信的，她在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毫不避嫌，将那一年她发表的两篇小说《钟绿》《吉公》都选了进去，在入选之作中，《钟绿》《吉公》都堪称上乘。后来，有人编了一本《京派小说选》，选取了林徽因的三四篇小说。

研究新月派诗歌，不可忽略林徽因。研究京派小说，也万万不可忽略林徽因。

王吴军 据《人民政协报》